

## 缅怀史念海先生

[编者按] 1934 年 3 月 1 日, 顾颉刚、谭其骧诸位先生在北平创办的《禹贡半月刊》, 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份学术刊物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遽而停刊)。迨 1981 年 7 月, 史念海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 1 辑在西安问世 (自 1987 年第 1 辑起转为季刊), 同年 11 月,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创刊号在上海问世, 两种刊物比翼齐飞, 延续至今, 深受学界欢迎。本刊创办之初, 史念海先生赓续颉刚先生的育人精神, 知难而进, 擘划经营, 为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开辟新的学术园地。本辑兹集中发表一组文章, 借以缅怀史念海先生终生的学术追求和人格魅力。

### 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史念海先生

张修桂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20 世纪 30 年代, 从《禹贡》半月刊创刊开始, 标志着新生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但是关于它的学科性质, 究竟是属于地学的范畴或是史学的范畴, 始终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限、手段和方法。从表面上看,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限是历史时期, 手段和方法主要是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辨析、归纳的考证。因此, 历史地理学很容易被认为是属于史学的范畴, 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直至前些年, 国家有关部门将历史地理学划归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其主要原因也当在于此。当然, 这种划分与我国现实的历史地理研究单位, 大多挂在社科部门和高校历史系也不无关系。

其实,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有关部门所作的学科归类, 更是错误的。众所周知, 学科的性质, 决定于学科的研究对象, 而不是其他。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是地理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 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 属于地理学研究的“昨天”部分。所以,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三位奠基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 根据自己数十年研究的亲身体会, 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属于地学范畴, 地理

学的分支学科。目前, 学界的继承者, 秉承三位元老的观点, 对此已有基本统一的认识。

此前之所以会出现争论, 实有其历史原因。新诞生的历史地理学, 乃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 从当时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关系而论, 沿革地理始终难以摆脱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命运; 而从历史地理学诞生之后的三、四十年间, 沿革地理仍然被视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从事的研究者大多又是史学工作者; 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基本上就是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至于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演变过程的概念, 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在当时的学界尚未完全确立。因此, 关于学科的性质, 存在争论, 在所难免。

可喜的是, 通过近四十年的争论和探索, 认识不断统一,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实践工作中得到不断发展, 学科体系也得以逐渐完善。更重要的是, 争论促使学科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 发展演变成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同仁普遍确立了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的新观念; 并深刻认识到, 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 必须如地理学一样, 对研究地区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调

查研究。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史念海先生以实际行动，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史先生在《河山集》第二集的《自序》中指出，“以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讹误和疏漏，这就要作一番考证。可是考证也并非都能解决问题，如果能够到当地进行考察，问题有可能会迎刃而解”。史先生还感慨，“历史地理学虽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它的研究者中间这样的工作还未相习成风，就是我自己也需要作更多的充实。因为这是一宗新的工作，在工作中就易于有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从1972年开始，史先生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游、太湖周围，作了长时段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考察。尤其是对于黄土高原地区，史先生的足迹不但遍及各个县邑，而且“曾五渡黄河、再越伊、洛两水，往来于吕梁山下和熊耳、伏牛山中；也曾四登陇山和子午岭，徘徊于六盘山东西，直抵泾水源头及清水河行将汇入黄河之处；也曾西汉水上游祁山之上，细究诸葛亮一再出兵其地的原因；还曾北登鄂尔多斯高原，探索明成化年间王越奇袭鞑靼满都鲁于红盐池的所在”。正是由于史先生坚持采用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河山集》第二集的《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上下篇、《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由历史时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等等论文，用谭先生的话说，“篇篇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以，谭其骧先生在为《河山集》第四集作《序》时，高度评价史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谭先生指出：史念海先生“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大，可不言而喻”。根据谭先生的观点，这个新的阶段，当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今已经历了整整40年的历史。

史念海先生开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特点是：

#### 1. “治学方法突破前规”

这是谭先生所归纳的新阶段最大的特点，也

是史先生为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所作出的最大贡献。正因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史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突破单纯依据历史文献的前规，采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相当普遍，从而使学科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科学、切合实际。

当然，在这一新阶段来临的前后，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也为学界在治学方法上突破前规作出表率。侯先生对于沙漠地区历史地理所取得的成就，如发表于70年代《文物》、《考古》上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变迁》、《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等论文，都是和他的实地考察工作分不开的；侯先生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北京市。而谭先生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繁忙期间，也于1974年带队考察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并发表了《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又于1977年对长江中游和黄河下游作了路线性考察。其后因生病不得不遗憾地中断实地调查。谭先生对历史地理的实地调查一贯极为重视。在为史先生《河山集》第四集作序时就说：“作者在第二集《自序》中举了若干文献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一经实地考察便迎刃而解的例子中，就有永乐城、仙人关、萧关、祁山、函谷关、潼关以及战国与秦代长城遗址等在军事史上极重要的条目。这篇序已使我极为欣慕感慨，欣慕的是筱苏作出了如此令人叹服、足以显示新中国高水平的杰出成果；感慨的是我老矣，不可能再追随筱苏之后也作些实地调查”。所以谭先生“希望历史地理界的同志们，特别是具有足够学历的中青年同志们，都能够通过读《河山集》第四集，引起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兴趣，并学习筱苏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密切结合的治学方法”。

此后，学界同仁不负前辈们的殷切期望，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实地调查已在研究工作中蔚然成风。其中，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蓝勇团队，成效就非常显著，并为此编辑出版专业性刊物《中国人文田野》。

#### 2. 地理学分支学科地位的确立

史先生在《河山集》第四集《自序》中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又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悠久的历史渊源使它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新的时

代意义却使它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

史先生所说的这个“新的时代”，当如谭先生所论述的，是从史先生开辟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的将近40年间，学科的性质尚在争论之中，沿革地理仍属主要内容，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也大多是历史学的。而从史先生开辟了“新的时代”之后，由于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具有一致的研究对象，目标又都是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地理环境的研究以掌握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治学方法突破前规，所以历史地理学顺理成章地正式确立了它在地理科学中的地位。因此，史先生说“新的时代意义却使它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由此，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地理学会的指导下，也开始了正规的运作。在它的主持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召开了15届全国（含国际）历史地理学术年会，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促进了学科的迅速发展。

### 3. 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创建

学科地位归属的确立，并非单纯的学科划分问题，而是关系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新的时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昨天”的组成部分。因此，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只要是“昨天”有史可查的，也都可以成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正因为端正了学科地位，从7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随之不断涌现。

历史军事地理学，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们历史地理学界，史念海先生就是这门分支学科的奠基人。70年代初，史先生接受兰州军区研究陕西省历史军事地理的任务，深感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须多方吸收前贤已经取得的成果，若求文献记载与实际地理形势相结合，就须要改弦更张，而不能再墨守成规”。

“必须亲自莅临各处旧战场作实地的考察”。所以，仅在1972年至1975年的四年内，史先生就对陕西境内历史上的古战场进行了六次的实地考察，最终完满地完成了《陕西军事历史地理》巨著，相关的论文则收在《河山集》第四集中。史先生的这两部著作，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历史军事地理这一分支学科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地理学两大分支学科之一的历史自然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殃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建国后三十年间，以得天独厚的时代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基础也比较好，有利于学科的创建。所以当中国科学院将《中国自然地理》列入1973~1980年重点科学规划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便成为这部巨著的一个分册。《历史自然地理》分册各章节，从1973年开始撰写，中间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并于1976、1977、1978三年中，先后在西安、上海、开封三地举行了为时达四个月的定稿会议，还分别到武汉、南京、郑州、杭州等地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编撰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尽管该分册还存在不足和缺陷，但从1982年出版以后，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促进了历史自然地理学的深入研究。因此可以说，《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在“新的时代”里诞生。

以上历史军事地理学和历史自然地理学，可以说都是创建于史先生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70年代。进入80年代，在谭先生的一再推动下，历史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已如雨后春笋般地得到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体，这是新阶段的又一个新局面。

## 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 ——从几封信札说起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

改革开放以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治学道路上已走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回想起来，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曾经得益于一些学术前辈的教诲与指点。1977年，我请教白寿彝先生：“今后应读些什么书？”答曰：“读史学史方面的书。”于是，

在“阔别”了中国史学史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在我要下决心是否以唐代史学作为研究领域时，我得到漆侠先生的支持和指点。我在撰写《唐代谱学简论》一文时，曾就魏晋谱学与隋唐谱学的关系，致函韩国磐先生求教，韩先生复信